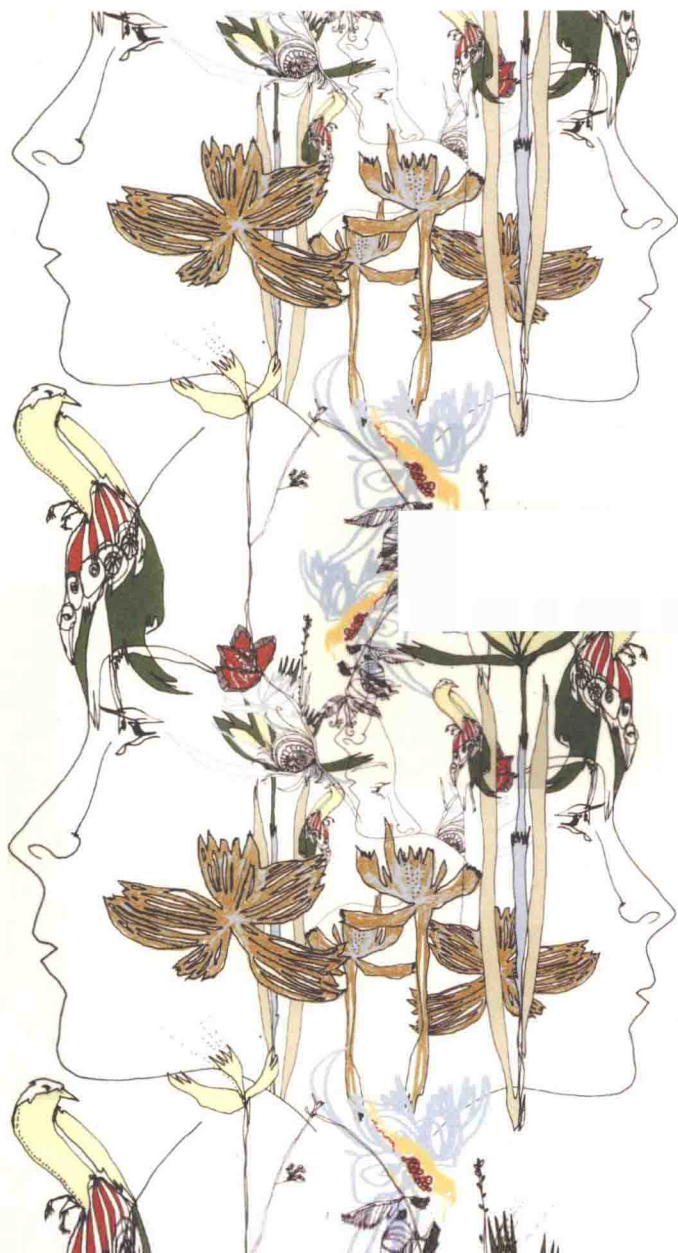


主 编 (美) 伊丽莎白·韦德 何成洲
Edited by Elizabeth Weed and He Chengzhou

当代美国女性主义经典理论选读

Essential Readings in US Feminist Theory

南京大学出版社



- 南京大学人文基金资助 -

主 编 (美) 伊丽莎白·韦德 何成洲
Edited by Elizabeth Weed and He Chengzhou

Essential Readings in US Feminist Theory
当代美国女性主义经典理论选读

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美国女性主义经典理论选读 / (美) 韦德, 何成洲主编.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305-13072-4

I. ①当… II. ①韦… ②何… III. ①女权运动—理论研究—美国—现代 IV. ①D4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2208 号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In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1991
Copyright © Donna Haraway 1991

First published by Free Association Books Ltd, represented by
The Cathy Miller Foreign Agency

A Question of Genius: Are Men Really Smarter than Women

Copyright © 1985 by Basic Books

This selection originally appeared in MYTHS OF GENDER: Biological Theories about Women and Men
(Revised Edition) by Anne Fausto-Sterling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of "Chapter 2: A Question of Genius: Are Men Really Smarter than
Women (pages 13 to pages 60)" is published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2012-15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出版人 金鑫荣

书 名 当代美国女性主义经典理论选读

主 编 (美)伊丽莎白·韦德 何成洲

责任编辑 郭艳娟 胡 豪

照 排 江苏南大印刷厂

印 刷 盐城市华光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7 字数 293 千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3072-4

定 价 45.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80 年代以来美国女性主义的一种谱系

(美) 伊丽莎白·韦德/布朗大学

女性主义话语产生于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扩张的联结处，一向具有国际性。妇女解放问题是个现代性问题，有些人认为它是现代性的基本问题。“妇女问题”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许多国家浮出水面，带有与对妇女地位“开明”理解相关的普遍化要求。但是，纵观历史我们得知，不论妇女解放在不同文化中的提出方式多么相似，有关文化形成、政治、经济的内部分歧和外部的地缘政治定位，决定着这一普遍化要求的接受方式。

一个多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和新自由思想意识如此盛行，把握在跨国女性主义话语中发挥作用的众多差异比以往难度更大。考虑到知识的“全球化”生产，理论话语可以越来越商品化，跨国知识看似越来越对等。以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和中国女性主义理论为例，迄今为止这两大理论体文献的翻译非常有限（中国女性主义文献英译的缺乏为这一翻译亏空最为显著的体现），并且对两大体系内各种理论谱系复杂性的认识也很有限，因此简单寻找和发现明显共性的做法非常诱人。事实上，许多使用英语的妇女研究项目把全球化隐喻作为扩充其研究对象的理由，进而将触角延伸到之前美国领域的范围之外，比如国际研究和发展研究。这些妇女研究项目有时运用批评视角探讨全球化问题，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全球化范围由推崇妇女权利的新自由政治框定，从而为查找定位各地妇女的共性提供现成框架。这一普遍化推动力可导致文学评论家和女性主义理论家盖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所言的认知暴力或者非西方认知方式的抹消。斯皮瓦克受米歇尔·福柯的著作以及他对知识与权力关系表述的启发，认为知识的建构对于知识的成效至关重要。若考虑的问题是妇女（复数）问题或女人（单数）问题，认知对象的建构方式尤为

重要。

在《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一书中，汤尼·白露（Tani Barlow）使用修辞术语“词语误用”突显所有与妇女相关的理论所包含的难点。如果“词语误用”表示词不能恰当指涉其指示物的情形，反之亦然，白露不去寻求确定含义，而是看一个历史学家能够从这一用词极为不当的情形中学到什么。“我的方法是利用脱漏部分，使历史性的词语误用在分析上的不充分转变成积极价值。专有名词被重新视为历史性的词语误用，无所不在、具有描述性时，它们就成为社会经验的可辨认的存储体。比如，‘女性’和‘妇女’的误用对于中国女性主义的妇女历史至关重要。”^①通过探究各种术语的理论化和调用方式，并从史学角度查看它们，白露可以了解批判性思维和生活经验，但是她认为，它们二者总是开放的、异构的、不断变化的过程，结果是一个不回避复杂性和矛盾的研究。

当人们试图把内部复杂、难以映射彼此的两大理论体联系在一起时，挑战就放大了。就美国和中国女性主义理论而言，它们面临着对肉体性、主体性、性征、性别、亲属关系明显不同的概念设想，对公与私的不同构想，不同的哲学和宗教传统，以及差别很大的两条历史轨迹。在这种情况下，关注差异和共性所起的作用颇为重要，有助于转向批评实践，它考查给定知识体系成为可能的条件。批判可使人尽力避免只发现已知知识，延缓辨认比不假思索地假定自己理解所读内容更为可取。通过询问一个术语或者知识体取得的理论和政治成就，用白露的话说，人们可以开始看到“社会经验的可辨认的存储体”。

这本文论选秉承批判精神，旨在提供当前美国女性主义理论的一种谱系，大部分选文写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只有三篇（它们的作者分别是朱迪斯·巴特勒，周蕾和钱德拉·莫汉蒂）是在新千年之后发表的，但是这些文章同样是反思早些时候提出的问题。女性主义理论该走向何处在80年代的美国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中国的情形也是如此。事实上，当前女性主义内部进行的争论无不以某种方式受到了这些早期议题的影响。文论选中呈现出的这一时期主要的女性主义理论事件有：能动性 with 权力理论的重构；转向作为分析范畴的“性别”；呼吁关注国内和跨国妇女之间的差别，构成对男/女差别理论的一种挑战；积极参与科学知识和方法论的假定。

^① Tani E. Barlow.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

如果没有认识到法国后结构主义在美国女性主义理论（英美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部分）的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就无法理解正在讨论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法国知识革命对整个美国学术界尤其是女性主义思潮影响巨大。雅克·拉康、路易·阿尔都塞、雅克·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米歇尔·福柯以及诸如朱莉娅·克里斯蒂娃、露西·伊利格瑞这些女性主义者启发大量努力理解系统性厌女症的英美女性主义理论家迈向令人兴奋的新方向。处在紧要关头的是从曾在英美思想界占据（现在依旧占据）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观点，向对西方哲学传统进行激进的后结构主义批判的根本转变。这一批判建立在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和其他大陆哲学家的作品之上。

后结构主义理论化使得英美女性主义者能够摆脱科学理性、量化验证的要求，语言仅为标示外部现实工具的实证主义限制。在分裂主体和无意识的心理分析概念中，在德里达对绝对起源和全部在场的西方幻想的批判中，在视语言为一种关系差异系统的众多理论中，在福柯关于话语的生产维度的理论中，女性主义理论家们发现了新的批判可能性。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前沿，正如盖亚特里·斯皮瓦克描述的那样，具有心理分析、解构、马克思主义特征。但是80年代中期，情形开始变化。

能动性 with 权力理论的重构

这一重要发展源于对福柯思想认识的两种转变。诸如《规训与惩罚》和《性史》第一卷的书籍提供了新型的颇具挑战性思考政治和社会现实的方式。在这些著作中，福柯论述了伴随着西方君主制衰败和民主推进的现代性，权力不能再被设想为自上而下行使的，即君主对臣民行使的等级制权力，而是在整个社会中以无数方式在话语中生产和调配的，这一论述众所周知。他认为，权力调配的关键是知识。现代民主社会就是通过生产知识实现规训和控制；认识身体的方式、健康与疾病、正常与异常、性征与主体性；社会成员正是凭借规范模式得以凝聚并且行使职责。

女性主义对福柯的态度不一。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者把福柯式分析看作不断努力探究妇女从属地位为何看似如此棘手、为何对改革中合理的进步努力抗力十足的重要理论工具。而接受更为传统更为实证社会理论的女性主义者深刻批评（他们视

为) 其对个人自主性和能动性的抹除。在他们看来, 福柯的分析并未呈现令人振奋的政治可能性, 却对政治行动本身构成巨大威胁。两大立场之间的争论紧张而热烈。

文论选的第一篇文章, 琼·斯科特的《经验的见证》, 戏剧性地介入这场争论。时下讨论“经验”范畴总是会提及这篇文章。斯科特是位历史学家, 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历史学家对福柯的批评最为激烈, 原因之一(正如斯科特在文章中指出的) 是这一时期, 经验成为历史学科尤为重要的证据范畴。至少有两个原因: 随着后解构主义对历史的假定客观性的攻击, “经验”成为共享意义的一个基础性证据; 随着被传统历史略去的人们(美国黑人、他族人、妇女、同性恋者等等) 的批判, 开始关注“差异”的历史学家期望从体验中获得授权。斯科特认为, 不管是个人经验还是集体经验, “体验”本身绝不是基础性的, 而是需要分析的。她写道: “我们需要注意到, 历史进程通过话语定位主体并生产其经验。并非个体拥有经验, 而是经验建构主体。对经验的如此定义并不是我们阐释的起点, 也不是为已知事物提供权威性(因为可视或可感) 的证据, 这种定义本身就是我们试图解释的话题, 阐释经验的过程也是生产知识的过程。”^①

性别转向

人类学家盖尔·鲁宾(Gayle Rubin) 在其1975年发表的《女人的交换: 性的“政治经济学”笔记》^②中指出, 现有的批评工具都不足以理解生成和延续妇女从属地位的机制, 他认为, 依照“生物性别(sex)/社会性别(gender)体系”思考, 可考察生物现象向文化和社会意义的转变方式。鲁宾的文章被广泛阅读, 原本仅作为一种语言标示(*la beauté, le courage*) 在一些语言中使用的“性别”(gender) 一词被更为频繁地运用到社会分析中。然而, 直到1985年, 琼·斯科特在其《性别: 历史分析的有用范畴》中对鲁宾的干预给予严肃的理论对待。在那篇文章中, 斯科特把性别定义为“基于感知到的性别(sex) 差异的一种社会关系组

① Joan W. Scott. “The Evidence of Experience.” *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 Ed. Judith Butler and Joan W. Scott. Routledge, 1992, pp. 25 - 26.

② Gayle Rubin,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Ed. Rayna Reiter.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5.

成要素”，而且作为“一种指涉权力关系的基本方式”。^① 尽管最初这一定义的提出是面向历史学家的，但是她的文章很快被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接受，“性别”成为女性主义研究的主导分析范畴。尽管福柯本人从未考虑“性别”概念，也对明确的女性主义问题毫无兴趣，但是性别范畴受到了福柯对知识和权力所做分析的深刻影响，这一点在斯科特对“权力”的提及中已有暗示。虽然琼·斯科特和朱迪斯·巴特勒都没有脱离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早期女性主义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心理分析，但是更多面向社会和受到福柯影响的“性别”，使得性别（sex）差异的无意识运作问题很快淡出研究视野。^②

在赋予性别理论概念活力方面，朱迪斯·巴特勒所做的工作首屈一指。从1990年出版《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到现在，她开发了性别的批评潜质，影响了世界范围内女性主义研究者和文化研究者的批评。巴特勒把大陆哲学对她思想形成的影响带入研究，她那著名的性别具有操演性的论断汇集了德里达的引用理论，德里达对英国哲学家J. L. 奥斯汀施事性理论的解读，以及福柯的权力、知识和话语性理论。不同于区分以言说事和以言行事（如“我把你当作我的妻子”）的奥斯汀，德里达认为重要的不是指示语言和施事语言之间的一些假定性差异，而是语言的重复性：意义的本质在于它可被重复。巴特勒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性别操演性理论。

巴特勒受惠于德里达的哲学批判，突显她的性别理论在西方读者中引起的独特共鸣，与在那一传统之外的读者中引起的共鸣未必相同。比如，李小江写道，“把社会性别概念引入中文是多余的，因为‘女’和‘男’早已被理解为社会的、非自然的生命体”^③。没有这样的理解支撑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思维，尤其在人们对科学思维的热情深化着自然/文化二分法的现代性里。诚然，巴特勒的激进部分源于她拒绝接受生物性别/文化性别的二分法。她努力唤起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认为性（身体的生物标识）和性别是在调控话语和规范行为内部不断重复的操演中生产的。

① 论文最初发表在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1, No. 5 (December 1986)。参见 J. Scott,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revised edition 1999, p. 42.

② 1999年出版的《性别与历史政治》的修订版中，斯科特表达了自己对理论家和学者使用“性别”方式的失望之情。在她看来，这一术语愈来愈常规化，通常为“男性”和“女性”的简单替换词。她转向精神分析理论，希望找到她所期望“性别”实现的不稳定效应。她目前从事心理分析理论研究，颇有建树。

③ 参见 Mayfair Mei-Hui Yang, *Spaces of Their Own: Women's Public Sphere in Transnational China (Public World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p. 262.

本书中的巴特勒文章选自她的著作《消解性别》。巴特勒依旧从基本的性别表演理论出发,探究“消解”一词的多重含义。消解限制某些人生活的性别和性征的规范性概念意味着什么?怎样进行这样的消解?怎样通过知识、权力监管范畴使得某些人被消解?在《身不由己:关于性自主权的界限》中,巴特勒反思性别和性征得以构建和瓦解的复杂方式,她的目标指向伦理和政治维度。在一个“人权”范畴如此无孔不入的时代,怎样思考“人”?她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中看到了脆弱性和自主性之间的持续关联。一个是在与别人的关联(亲密接触和社会交往)中构建的,一个是在可理解度框架之内和反对这一框架之中构建的。巴特勒说,问题在于一些人不被识别为人类。思考人类时人们要扩充性别的涵盖术语,不仅考虑男人和女人,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还要考虑变性人、跨性别者和具有非典型或不确定解剖特质的阴阳人。只要有些人被确认为不可理解,苦难、暴力和不公正就会接踵而至:“有人认为布奇(butch),法玛(femme)以及跨性别者的生活对于重塑政治和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平等的社会并不重要,这一想法不承认那些性别认同上与众不同的人在公共领域所遭受的暴力,也不承认这种看法反映了存在一整套有争议的规范,它们决定什么样的人才是政治范畴内真正的主体。”^①

巴特勒令读者回想起福柯的洞见:知识和权力合作,生产不可理解的生命和可理解的生命,它们可能被识别为有价值或没有价值。挑战在于抓住授权和强迫的机制。为那些要不然看似不可能的、不能理解的生命代言,为那些看似处在人类之外的生命代言,巴特勒扩充了共同未来的伦理可能性。^②

从一种差别到多种差别

我们可以在关于“差别”不断变换的辩论中追寻美国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轨迹。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有过关于“平等女性主义”对“差别女性主义”的辩论。“事实上,正如在许多其他国家,法国在争取妇女选举权(1944年赋予)的长

① Judith Butler, "Beside Oneself: On the Limits of Sexual Autonomy," in *Undoing Gen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 28.

② 巴特勒对性别的理论化在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和酷儿理论领域仍然具有高度影响力,但是精神分析文化批评的一个分支认为她的理论过度局限于社会领域。评论家,如哲学家 Slavoj Žižek、电影理论家 Joan Copjec,主张更多地关注精神形成的无意识维度。

期斗争中，赞成选举权的论争往往分为两大阵营：男女没有重要差别，因此妇女应有选举的权利；妇女不同于男人，对阳性过剩进行教化和纠正，因此应有选举权。”在其1949年出版的富有革命性意义的《第二性》中，西蒙·德·波伏娃强烈支持前一种立场。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哲学家，她向妇女在整个西方文化中被构建为男人附庸的方式和原因发问。从古希腊以降，妇女因为非男性而被贬值。借用电荷的隐喻，她把女人看成负极，男人看成正极且中性。波伏娃认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造就的”，这一论断符合其存在主义信念，即存在先于本质，人类主体的道德义务是接受那种自由的可能性和困难点，接受自己的存在自由意味着给予他人自由，不管是女人，被殖民的人，被奴役的黑人，还是犹太人。

如果美国女性主义理论追溯“平等女性主义”到波伏娃，那么“差别女性主义”主要与哲学家、心理分析学家露西·伊利格瑞联系在一起。但是伊利格瑞的“差别女性主义”与女人补充男人，为其男性特质提供一种文明化、人性化制衡力的观点毫无关系。伊利格瑞认为，这样的想法仅仅是男权主义文化虚构的一种延续，这一点与波伏娃不谋而合。在她的头两本书《窥镜：作为他者的女人》（1974）、《非“一”之性》（1977），伊利格瑞发起了或许最为激进的女性主义理论：“作为女人的女人从未在西方历史上存在过。”^①如雅克·拉康，他争辩说，“女人”是男权虚构的幻想，真实妇女被强迫模仿这一虚构物。伊利格瑞认为，巩固男权体制的象征界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变化，这是个乌托邦想法，但若妇女想要永远真正地过实体化的生活，摆脱男性关于女性身体（总是被视为母性）的幻想和焦虑，这一改变是必要的。

“平等女性主义者”与“差别女性主义者”的分离往往发生在学科边界处，前者大多在社会科学和历史学领域工作，后者则是在文学批评和其他人文领域，纵然许多人文学者同样偏爱平等观。两派之间的辩论通常是激烈的，80年代平等派正是借用“本质主义”术语指责差别派的。反本质主义者认为，身体（不管是男人的还是女人的）对主体性有影响的观念在政治上是倒退的。他们的目标是把妇女从生物决定论中解救出来，这就意味着摒弃肉体偶然性。

到80年代早期，美国“有色妇女”发起的有力批判使得两派之间的分歧永久

① “阴性书写”的法国支持者，如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和埃莱娜·西克苏，也认为“差别女性主义者”屈辱女性主体的观点不那么激进。大量英美女性主义者接受法国女性主义者的理论立场，更多人通过颂扬女性本质的“文化女性主义”的话语和政治反对“平等女性主义者”。

复杂化了。“有色妇女”术语一度被用来团结黑人妇女、拉丁美洲妇女和其他美国少数民族裔妇女以及“第三世界妇女”。“第三世界妇女”术语用来团结受到第一世界（主要是西方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影响的妇女。当然了，非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裔从19世纪的选举权运动到现在，一直活跃在妇女斗争和世界各地的解放运动中。引发20世纪80年代有色妇女和第三世界妇女大量生产女性主义理论的部分原因是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对男性/女性二分法强有力的理论关注。许多人认为，对差别的关注无视女人之间的众多差别（种族、阶级和性征差异），因而重复抹除女性主义被期盼消解的他者。

但是，正如文学评论家纳奥米·斯格尔（Naomi Schor）所指出的那样，差别（单数）与差别（复数）在理论上是不可分离的，这一洞见在我和她一起创办的期刊的标题中有所反映。期刊名为《差别（*differences*）：女性主义文化研究期刊》，其中字母s的字体不同于其他字母，表明这两个术语的不可分割性。依据德里达式解构主义和拉康式精神分析，七八十年代女性主义理论考察的“差别”不是男/女二元对立，而是差别如何运作正好覆盖内部差别，比如，男性主体通过等级制男性/女性的构建，巩固自身，因此竭力掩盖自身内部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分裂。同样的论点在种族、阶级和性征的差别问题上也是成立的，支配性术语（白人、欧美）因其与他者（黑人、第三世界）之间的关系得以巩固，而这些术语有效地抹除了这一关系。

文学评论家周蕾的论文《当白皮肤女性化……：补充逻辑的后果》从差别（单数）和差别（复数）的这些理论运作入手，回顾文学评论家托莉·莫伊（Toril Moi）的论点，进而构建自己的文本。莫伊在她1985年出版的畅销书《性/文本政治》中，对比了多数英美女性主义者（“平等女性主义者”和有色妇女）和多数法国后结构女性主义者的批评作品。莫伊认为，法国批评作品无可争论地优于英美作品，不仅仅因为英美观点在主体性和能动性方面是常识性的，而且这些质朴的观点声称自己在政治上是必要的，事实上因其置父权结构于完好无损的位置，在政治上是无效的。

虽然周蕾对莫伊的观点提出异议，但她的策略不是逆转莫伊的观点，而是削弱她观点的基石。周蕾认为关键问题不是女性议题上复杂观点对天真观点，而是她所说的“西方‘妇女’的补充逻辑”，这里周蕾借用了德里达的补充概念。德里达指出法语单词 *supplément* 有着双重含义，即增补和替代，因此具有不可判定性：补

充是附加不必要事物的多余，还是填充缺失？周蕾认为，西方文化中的妇女可以说就占据着这样一个补充的不可判定位置。男性是个稳定术语，而女性是不稳定术语。鉴于“妇女”认识论的不稳定性，可提出一个不同问题：“等到‘女性’与男性比肩而立，可以说‘男女’组合业已过时，倒不是说这种组合是异性恋的，而是说这样的组合应该被看作某种东西的一部分，这种东西原本的配置——譬如说阶级或种族——在添加被物质化的那一刻即变得有形可触。”周蕾继续解读英美女性主义者所欣赏的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和电影剧本《广岛之恋》，将玛格丽特·杜拉斯与法国理论先锋派联系在一起。周蕾认为，尽管英美女性主义和法国女性主义差异众多，在未能看清主人公的白肤色怎样试图遮蚀非白肤色的他者（《简·爱》中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第一任妻子和《广岛之恋》中的日本男情人）这一点上，他们之间的相似点多于不同点。周蕾认为，甚至都不是白肤色能够包含女性在文本中进行的补充性破坏。

盖亚特里·斯皮瓦克也提及种族、阶级问题与妇女问题的交织方式。同周蕾一样，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文学评论家，斯皮瓦克通过虚构文本探讨一些最具挑战性的理论问题。不同于周蕾的文章，斯皮瓦克的文章包含的不是一个持续性论述，而是一系列反思。事实上，斯皮瓦克颇为有趣地运用了“分散反思”模式。^①斯皮瓦克从翻译德里达的《论文字学》开始学术生涯，现已成为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最富有成效的理论家之一。她彻底地跨学科，对那些容易蜕变成教条的论调颇不耐烦，不断激励读者重新质疑。

本书所选的斯皮瓦克文章《女性主义及批评理论》写于1986年，由四个简短部分构成：第一，早期一次谈话记录；第二，对那些早先言论的评论；第三，对1979到1980年间她开始持续思考种族和阶级时的反思；第四，在国际资本主义中对第三世界妇女状况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数页文字里，斯皮瓦克能够唤起近十年来她自己的一些理论关注，这样读者便可管窥她帮助引导的几十年的变化和发展。正如她所言，虽然并未试图解释形成变化轨迹的思路，但她持续关注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以及解构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一大群评论家认为这四大范畴无论如何都是不兼容的。与这些人不同，斯皮瓦克不断重申持续探索这些批

① 参见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Scattered Speculations on the Question of Value,"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88.

评模式的需要，尽管（正如她在这里所展示的）这四大范畴之间的关系以及她与范畴之间的关系随时间发生变化。虽然斯皮瓦克的评论范围从主体性问题一直延伸到世界历史，但是作为知识分子，她的政治参与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专注，“相较过去，‘我觉得改变世界’不是那么简单。我有几个学生拥有作家真迹，其中有男有女，有女性主义者也有大男子主义者，我教他们如何阅读手头的文本，或许只能尽力而为罢了”^①。考虑到斯皮瓦克在评论界和理论界的国际影响力，可视其结束语为虚假的谦虚，指的是人们对待她的作品有如对待一位精英（大多是哥伦比亚大学来自第一世界的学生）的老师。然而文字游戏，即 canon（正典）指一批被视为基础性的作品，cannon（大炮）指毁灭性武器，揭示斯皮瓦克的信念，即：政治变革与批判性阅读实践从根本上讲是不可分割的。

西方之外

盖亚特里·斯皮瓦克绝不是将批评注意力转向非西方主体、后殖民主体和移民的唯一女性主义学者。爱德华·萨义德 1979 年出版的《东方主义：东方的西方式构想》，探讨西方知识生产和权力调配如何以各种方式生产“东方”，极大地影响了对“认知暴力”（运用斯皮瓦克的术语）兴趣浓厚的在美国定居的学者。斯皮瓦克出生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在那里接受教育一直到大学本科，同她一样，文论选中其他作者也是个人背景与研究兴趣相结合：周蕾出生在香港并在那里接受教育获得学士学位；钱德拉·塔尔佩德·莫汉蒂出生在印度孟买，移居美国之前已在德里获得硕士学位；海柔尔·卡比出生在英格兰的奥克汉普顿，是牙买加裔与威尔士人的混血儿，前往美国之前已在伯明翰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海柔尔·卡比的《白人女性听着！黑人女性主义及姐妹情结的局限》中的批评干预如标题的祈使语气一样强烈。整个 70 年代，许多英美女性主义者发展了旨在联合所有妇女的“姐妹情谊”话语。努力争取男女平等的主流改良派女性主义者和信奉妇女本质的“文化女性主义者”部署姐妹情谊的语言，比如著名的标语“姐妹情谊是有力的”。卡比在其文章中提出姐妹情谊概念的普遍化可及范围。卡比的愤怒语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她问道，视姐妹情谊为其理由和目标的运动怎能对排

^① Spivak, *In Other Worlds*, p. 97.

斥黑人妇女和其他非白人妇女的方式熟视无睹?^① 关于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运作方式相似性的讨论已有很多,它们都是文化构建物,以在“生物学”中固定低劣真实性为目标。卡比认为这样宽泛的比较远不足以描绘黑人妇女,“黑人女性的体验并未列入比较的范围。黑人女性同时受父权制、阶级和‘种族’的压迫,这是不进行这些比较的主要原因。这些比较不但使黑人女性的地位和体验边缘化,也使之变得无足轻重”^②。

黑人妇女不可见性问题不是由其缺席引起的。这个时期,许多白人女性主义者给出的答案包含:只要更为持续地把黑人妇女列入考虑范围,问题就能得以解决。但简单列入,仅是附加,并非解决方案。卡比认为增加黑人妇女需要重新考虑整个分析,这一论述预示着周蕾的妇女的补充逻辑概念。造成妇女不可见的是,考虑黑人妇女时,曾主导大部分白人女性主义的分析范畴不再有效:“女权主义理论至关重要的三个概念——‘家庭’、‘父权制’和‘再生产’应用于黑人女性生活时,它们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这些概念是在白人女性(常为中产阶级)的‘她历史’背景之下使用的。当运用到黑人女性的生活和经历时,它们是相互矛盾的。”^③ 她指出白人女性主义者展示妇女受压迫时运用的范畴在考虑黑人妇女时不再以相同方式起作用。比如,某些情况下,多数白人女性主义者认为这时候的家庭是压抑性的,而黑人妇女不这样看待,认为这时候的家庭是力量和抵抗的来源。一些白人妇女认为,家庭生活和母亲身份令人窒息,而许多黑人妇女都被拒绝拥有这样的权力,正如白人女性认为女性气质具有约束性,而黑人妇女都被拒绝拥有女性气质。卡比继续探究涉及黑人妇女时引发的众多复杂的差别,纷杂程度因西方资本主义市场扩张及与其相随的支配模式大大增加。在其文章的最后部分“建构替选方案”,关注社会正义的女性主义者警惕概括化话语,包括诸如“第三世界妇女”的术语。这些概括不仅使得其他民族和文化的复杂性不可见,而且,就女性主义而言,“他者妇女”,尤其是“第三世界妇女”,是把妇女看成野蛮压迫的受害者(西方视其为不可思议)而生产出来的术语。结果,妇女的真实经历超出知识的建构范畴,西方能够

① 在英国,“黑色”术语可指众多非白肤色民族;在美国,这一术语通常仅用于指涉非裔血统的人们。

② Hazel V Carby, “White Woman Listen! Black Feminism and the Boundaries of Sisterhood,” in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s. *Materialist Feminism: 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7, p. 111.

③ Ibid, p. 112.

强化启蒙只属于西方的意识形态观念。接着卡比问白人妇女,“你们所说的‘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作为结尾的问题。

关于“我们”的这个问题启发钱德拉·莫汉蒂写作《再探〈西方视野之下〉:反资本主义斗争中的女性主义团结》一文。在这篇写于2001年的文章中,教育社会学家莫汉蒂回到她1986年的文章《西方视野之下》。在这篇文章中,莫汉蒂沿着与卡比相同的路径论述道:

“‘西方女性主义者’对第三世界妇女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实际是对后者生活和斗争实行话语殖民。我写《西方视野之下》这篇文章旨在挖掘这一现象并对此提出批评。我想揭露女性主义跨文化学术研究中的权力—知识关系,这些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论貌似具有普适性,实则 是以欧洲为中心、服务于西方女性主义狭隘的自我利益。”^①

为反击女性主义知识生产的普遍化行为,莫汉蒂力劝跨文化女性主义研究应该“关注的是语境、主体性和斗争中的微观政治以及全球政治、经济体制进程中的宏观政治”^②。

十五年后,反思这篇文章及其接受方式,莫汉蒂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一些读者认为她的呼吁没有根据,具体化分析否决跨文化的政治可能性。2001年的文章中,她继续警告第一世界学者注意其研究和教学的政治影响,同时强调跨文化女性主义团结的重要性。她确实在呼吁“跨国的、反资本主义的女性主义政治”。细查两篇文章发表的时间间隔里世界如何变化,她谈到全球资本扩张,伴随全球市场扩张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压力和随之而来的环境恶化。虽然卡比认为“第三世界妇女”是个不令人满意的术语,莫汉蒂保留它,但也承认其问题和隐含义。此外,这个历史时期的所有可用却不令人满意的分析术语中,或许较为合意的是“三分之一世界/三分之二世界”,表明全球权力和资源的分解。

展望女性主义工作的未来,莫汉蒂聚焦反全球化努力,教学政治为其计划的一部分。她发觉,几乎所有妇女研究项目都期望国际化其课程,但并非所有模式都能

①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Under Western Eyes’ Revisited: Feminist Solidarity through Anticapitalist Struggles,” *Signs* 28, 2 (2003), p. 501.

② Ibid.

促进她呼吁的跨国女性主义政治。她所说的“作为旅游者的女性主义者模式”或者“作为国际消费者的女性主义者”原封不动地保留欧美偏见,使得学生确定她的观点是真的,包括其他地区的女性作为受害者需要西方救援的观点。另一方面,“作为探索者的女性主义者模式”告诫“外国”文化独立于美国或欧洲文化。人们从这种研究中获得的知识可以是复杂精细的,但是漏掉了全球化产生的联系。莫汉蒂认为,这一模式的问题在于“无论妇女们居住在哪个地理区域,她们的生活即使不相同却也是彼此关联、相互依赖的”。她推荐的模式“女性主义团结或女性主义比较研究模式”中,差异和共性能够在彼此间的关联和张力中共存。“需要强调的是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共同责任和共同利益,并使女性主义团结的观念深入人心。”^①

对科学的挑战

几十年来最前沿的女性主义理论都产生于解释性、定性领域,而非科学领域,这并不是偶然的。致力于公正性和客观性的科学被认为是公正研究的安全空间,处在争论之外。然而,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跨学科研究的兴起,人们对科学本身的话语生产提出越来越多的疑问。比如,科学历史学家开始仔细研究20世纪头几十年基因遗传理论怎样与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发生联系,生成时下备受怀疑的优生学“科学”。人们很快意识到,这样的研究不必限于暴露伪科学,批判性科学研究也不必把去除科学权威性作为其目标。今日,日益国际化的科学技术研究领域视科学技术为社会嵌入式实践,这一领域的许多成员都是训练有素的科学家,所有成员都致力于充实科学技术实践。

布朗大学科学技术研究创始人之一安妮·弗斯特-斯特林受过发育遗传学教育,她在性别的生物学和性别身份的发展领域取得的成就众所周知。从事科学研究伊始,她坚持至少两个基本论点:自然与文化的假想对立已被消解;可把科学客观性看作必要的、高度复杂的目标。某种程度上说,这两方面都取得了进展。比如,实验胚胎学领域是唯一破坏自然/文化边界构想的领域;客观性不再是科学历史早期没有疑问的价值。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弗斯特-斯特林1985年的文章《天赋的问题:男人真

^① Mohanty, 521.

的比女人聪明吗?》已经过时。任何科学讨论三十年之后都会过时,这无可避免。然而,有趣的是,就在不久前,也就是2005年,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一次会议上说,性别之间的内在差异是相对少数妇女在科学和数学领域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这一陈述引发轩然大波,导致他2006年卸任校长。很明显,激怒多数人的不是这些领域女性人数少于男性人数的经验观测,而是没有足够科学证据把这一差异归于男女内在差异的推定。原来,萨默斯的这一陈述基于一个同事的观点,这一同事自己不进行认知科学领域的基本研究,而是解释别人在这一领域取得的研究结果。其实,随着时下人们对神经科学兴趣的大爆炸,许多推广者,自己通常不参与基础研究,却推论出有因果关系的断言,弗斯特-斯特林在其1985年的文章中曾对这类推论进行过分析。

弗斯特-斯特林的文章密切关注每当人们想要在科学论证的现象和复杂人类行为之间建立起某种非线性因果联系时所涉及的问题。正如弗斯特-斯特林所说,努力对认知中宣称的性别差异进行生物学阐释“没有鼓吹或攻击其中的政治意义。这种生物学解释失败的原因在于它们错误地理解了生物学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并将其作为阐释的基础”^①。弗斯特-斯特林认为,所有牵涉的人,包括如此渴望接受与自己观点相一致的科学理论的公众,要能欣然接受这些问题对正在进行的科学探究发起的激动人心的挑战,而不是让这些错误解释经久存在,便可从中受益。

弗斯特-斯特林的文章仔细分析了一组科学研究和断言,而多娜·哈拉维富有生动性的文章从科学延伸到科学小说,从性别延伸到全球资本。最初发表于1985年的《赛博格宣言:20世纪80年代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同样影响深远。对于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和科学技术研究、哲学和灵长类学领域的发展,的确很难夸大文章的重要性。哈拉维在许多领域接受了非凡教育,包括哲学、神学、文学和动物学,并在哈佛大学获得生物学博士,她那出色的、富有想象的构想生成(并持续生成)令人兴奋的争论。

正如哈拉维所言,文章是一个宣言,声明以不同方式思考以便以不同方式行动的需要。它的政治倾向在篇首就已陈述:它是女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物质主义的,因为它与生活经验的物质实践相关。她说,这是反讽式的,不是因为它不是真的,而是它愿意容忍字面和比喻意义的差距,愿意细查轻易不能解决的矛盾。而

^① Anne Fausto-Sterling, "A Question of Genius," in *Myths of Gender*, Basic Books, 1985, p. 60.